

● 发展理论研究

中国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对十年改革的消化与思考

高 清 海 孟 宪 忠

§1 改革：呼唤着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十年改革，成绩斐然。最主要的是打开了关闭的国门，看到了世界的真实面目，开始学会从世界大背景下看待中国问题，从而形成了改革大趋势。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逐步把中国改革引向深入，无疑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改革出现困难、挫折，而看不到开放、改革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无疑是短视。

但勿庸讳言，一年来改革也出现了一些我们始料不及的问题，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疯狂投入、惊人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通货膨胀、收入差别悬殊；政治腐败、法纪松弛；文化贬值、教育滞后；宏观失控、令禁不止；道德堕落，人心失归。使开放、改革面临重大风险。

这一切说明，开放、改革只是为中国社会迅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并不能保证开放、改革本身注定成功。这里还有一个以什么理论指导开放、改革的问题，有一个怎样开放、怎样改革的问题。

分析开放、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面对改革这一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缺乏整体把握，没有从社会发展理论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分析，并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尽管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分别研究改革，但对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似还空白。各学科多从自己的透视角度来认识改革、评价改革、引导改革，出现了各学科缺少整体背景，过分夸大自己学科、自己思路对改革的价值和意义的情况。实际上，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基础和先导，任何一门学科都难找到自己恰当的空间位置和时间位置，也很难处理改革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与人的效益的关系，处理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也很难避免各项政策带有浓厚的局部性和暂时性色彩。缺乏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将成为我国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巨大障碍。

§2 建设中国自己社会发展理论的参考系和立足点 中国是地球村落的一个村庄。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有许多共性。前车可鉴，后车可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应尽可能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少付不必要的代价。我们认为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应有三个参考系。

第一个参考系，是西方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社会发展理论。探讨非西方国家现代发展问题的发展理论，是战后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简括来看，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第一种是以西方为方向的发展理论：以西方国家的早期发展为参照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实现发展的途径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工业化程度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这种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种种经济增长模式。如哈罗德—多马模式、罗宾逊模式、卡尔多、刘易斯模式等等。这种理论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第一、经济追踪第一。50—60年代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西方发展理论设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表现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代价太大：环境破坏，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动荡，首先是一小部分官僚贵胄实现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高消费，而广大人民的生活并无太大改善。这一切引起人们深思，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杠杆是否只是“经济增

长”？经济增长是否意味着发展？“有增长而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恶性增长”一些术语的提出，启发人们从只要“经济增长，一切就都会好”的梦幻中逐步清醒过来，从“追踪”的梦幻中清醒过来。

60年代，一些研究发展的学者们放弃了追踪西方国家模式，开始尝试从第三世界国家本身的实际出发，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处境和现实发展道路，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的现实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不能是不切实际地追踪西方的经济指标，不能把改善人们的生活推到国民生产总值大提高和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改造以后，而应是从本国实际出发，逐渐稳步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就业状况如何，才是衡量该国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现实的发展理论反对过多过快的产业结构改造、技术变化和资本支出，注意通过农业化肥、水利、机械投资来提高农业产出，而不盲目地农转工、农转商。

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更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群众必然从经济增长获得生活质量提高这一事实，引起国外学者们对发展概念和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反思。弗朗索瓦·佩鲁、依安·米勒斯等一大批学者在70年代前后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人才是发展的最高要求。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评价发展的价值前提，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平等、根除贫困、人的自由、生态平衡、民主。不实现这些价值，虽有经济增长也不会有人与社会的发展，即人与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而且还取决于政治的发展、教育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与“追踪理论”的最大区别是从对物、对经济增长的重视转向了对人的重视，把“增长第一”转向为“发展第一”。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实践和历史上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发展理论启发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增长必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物质利益和发展机会，也不能把经济增长作为最高目的而把人异化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更不能把改革过程看做为“经济增长”付代价的过程，把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发展都推到实现了现代化再去实现。否则，人民群众就会失去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所以，在三代发展理论基础上，追求我们的发展理论最为可取。无视三代发展理论成果，只停留在以西方国家为模式的“经济增长第一”、“经济追踪第一”的第一代发展理论水平上，实属浅薄。

第二个参考系，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十年来，虽然我们也讲开放，讲向资本主义学习，但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借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上，而是偏向传统资本主义。当改革中出现重商主义、工商倒挂的时候，一些学者就论证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中也有重商主义，也有“官倒”；当改革中出现收入差别悬殊、贫富拉大的时候，又有人寻找据谈论资本积累之初必然引起社会利益重新分化；当改革中出现政治腐化，造成大量经济损失，群众强烈不满的时候，还有人论证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也出现腐化，言外之意，政治腐化是发展商品生产不可避免的产物；在掠夺资源、破坏生态、野蛮竞争、拜金主义面前，还有人说这是发展商品经济必付的代价，是从无序到有序的必然过程。

这种比较、论证方法，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今天发展商品经济是不是必然退回到早期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今天发展商品经济是不是无法避免早期资本主义自发性、盲目性，无法避免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代价？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今天的历史背景下完全走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生产的道路已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城市化、农业改造过程中，虽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人口、能源、生态问题都不象现在这样严重，危害尚不大。今天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改造过程，如果不加强计划、预测，就给生态环境、给进一步发展造成的损害、给人造成的损害可能就是不可弥补的。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是一种掠夺式的积累，这种积累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和不可避免性。今天我们如果也以掠夺分化的方式积累，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已经不断总结经典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生产的经验教训，而逐步完善自身。例如，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重视发挥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因素的作用，而人的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的发挥都与教育密切相关。所以，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把教育做为立国之本。美国年度教

育经费达到3000亿美元，超过了我国教育经费的60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重视计划性而不单一依靠市场决策。为了保证商品竞争原则不遭受破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惩罚伪劣商品制造商、销售商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定了文官制度，规定了政府公职人员不准从事商品生产商品交易，从而保障着经济活动运行在法治规范中，同时也保证了社会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增殖财富，同样碰到一个如何开发有限资源和保护环境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越来越引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现在美国已有120多个环境法规，形成了完整的环境法体系。其内容涉及污染控制、环境中各种有毒物质的控制、所拟议的经济发展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分析，以及各种自然环境区域的保护。这一切使得美国的环境状况有了根本好转。因为人们都已明确认识到：由于今天工业化程度空前提高，化学工业、核能工业空前发展，这些工业技术所带来的污染不论从质上还是量上看，其严重程度将是不可逆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是推行福利政策的国家。福利政策的实行，减少了绝对富裕层和绝对贫困层的人数，增大了中产阶级。由于有失业补贴、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即使贫困层的生活水平也在发展中国家中等生活水平之上。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调整政策从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结构方面保证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动态平衡发展。初视现代资本主义经验，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最重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对社会发展的理性、自觉性不断增长，不断协调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这与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自发性、盲目性比起来已有天壤之别。我们今天发展商品生产、开放改革，应该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而不能让社会非理性地放任、冲动。质言之，我们认为中国今日的改革和发展应以现代资本主义为重要参考系，尽量避免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那种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性、盲目性、代价性为我们改革中的失误、错误找借口的论调，有百害无一利。

第三个参考系，是苏联改革思路。苏联与我国国情不同，自然各有各的改革思路。但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面临很多相同的问题和任务。特别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多是从苏联搬来的，苏联改革所指向的问题和弊端，在我国也存在着。所以，我们也必须借鉴苏联改革的经验。

面对苏联改革的思路，我们不能抱着一种病态的自尊心不承认，不能再象50年代争国际共运领导权那样去争社会主义改革的样板地位。而应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改革的现实，吸取一切有益经验为我用。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思路，包括改革的目的、标准、途径和突破口、方法论原则等一系列内容。

自27大以来，戈尔巴乔夫多次强调改革就是为了“多一些社会主义”。而“多一些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生活中多一些文明和人道主义，多一些人的尊严和自尊”。戈尔巴乔夫屡破禁区，在国内外多次疾呼：要尊重人权，实现人道主义。

对于改革的标准，戈尔巴乔夫有独到之见。苏共27大提出衡量改革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改革能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看改革能否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加强，人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第一条促进经济发展的标准又是服从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这一标准。戈尔巴乔夫说：改革，就是要“努力把社会的全部智能和文化的一切条件用来造就对社会持积极态度、精神丰富、有正义感和诚实的人”。“改革如果失掉了人，那就是改革的失败”。

对于改革的途径，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必须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动”。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是来源于制度的硬性规定，而是来源于人的自觉性，来源于社会对他的价值的肯定和尊严的尊重。他号召苏联理论界研究如何内在激活人的因素。他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人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发挥，改革本身才能实现”。

以人为改革的目的，以是否有益人的发展为改革的标准，以通过民主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为改革的动力和途径，使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打上了深深的“人”的烙印。苏联理论界十分重视戈尔巴乔夫的关于“人”的思想，组成了“人的问题综合委员会”，全面深入地展开对人的研究。以人为改革核心的思路和苏联理论界对人的研究的成果引起了世界性关注，以致一些西方学者评价戈尔巴乔夫试图在使苏联将来的历史人道化。以人为核心，苏联改革的突破口自然而然地选在了压制民主、压制群众积极性发挥、腐化社会的最大障碍机制——政治体制和官僚主义。从政治改革入手，是苏联改革的突破口。

在今日世界上，“新思维”几乎成为戈尔巴乔夫的象征。新思维不但思想内容新，而且思维方法论原

则也有新颖之处。戈尔巴乔夫反对单一性思维,他指出:社会的复杂性和改革的艰巨性,决定了方法的非单一性。单独因素都受系统质的规定。不能认为用一种方法就可以包打天下。改革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要从多方面思考和研究。戈尔巴乔夫的多因素系统论的思考是否能启发我们从那种“经济增长,一切就好”、“包学进城,生产就灵”的单一思路走出来?戈尔巴乔夫反对极端思维,反复强调事情必须要有度。在改革过程中,苏联制定了限制非劳动收入,打击投机倒把等一系列法规,就是为了把个体收入控制在一定范围,防止出现两极分化。这种思考是否比我们那种“下不保底,上不封顶”、“横干竖干,赚钱好汉”的方法更高一筹呢?有预见性是戈尔巴乔夫思维方法论的又一个原则。戈尔巴乔夫清醒地意识到:事情总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包括改革也可能失败。所以,戈尔巴乔夫总要对未来多种预见,这使得苏联改革的一些政策、法令具有超前性。限制非劳动收入,防止贫富分化,实行公开性,限定商业利润与工业利润比例,规定公民起诉干部渎职法律,这一切防止了社会失控、通货膨胀。苏联改革思路给我们的启迪之处颇多,最重要的是苏联改革对人的重视和戈尔巴乔夫思维的现代水平。

我们提出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立足点,不是想按玄思的方式去建立什么理论体系,而是通过社会学的调查,整理十年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面临的矛盾和冲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助三大参考系,从实际升华出理论,对现实作出理论分析,运用理论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找准问题、分析问题的实质、对问题给出理论评价,这是重要的一步。在对现实调查、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理论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3 社会发展的目标 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不能等同于经济目标,更不能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社会发展目标是一个目标系统。社会发展目标从领域上看,区分为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从客体主体上看,区分为物质目标与人的目标;从直接性间接性上看,区分为直接目标和间接目标、暂时目标和长远目标。各个目标在目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并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片面夸大某一目标的价值和意义、放大某一目标的地位,或者为了暂时目标而忽视长远目标,都要造成发展系统目标、系统质的畸变。一些地区和单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惜能源高消耗、资源高消耗,无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生产虽然暂时上去了,但难以维持,同时人的生活质量因生态破坏也严重下降。据国外学者研究,我国十年来是世界上资源投入最多、生态损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实警告我们必须把保护环境也作为发展目标之一,决不能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在改革过程中,缺乏系统发展目标还表现在我们缺少人的主体目标设计。宁佛人只是经济人,只是生产力,只是创造经济效益的工具,人自身没有发展目标和要求。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中国未来的主体,而现在全国却有上千万中小学生失学、流学,童工、童农、童商、童贩现象相当严重。如果未来的主体都是一些文盲,中国何以进步发展?全面认识、合理配置发展目标,这是建立中国发展理论首先遇到的问题。

§4 社会发展的途径 发展的目标制约发展的途径。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认为经济增长后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与我国改革实践都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其他问题,实现其他目标,例如政治民主、为政廉洁、发展教育等问题并不是伴随经济增长自然就解决的。经济增长了可能与上述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也可能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带来障碍。经济增长后分配不公平,可能造成权力与金钱的结合。所以政治民主、发展教育等自身作为发展的目标,有其独特的发展途径和发展要求,不能待到经济增长后再去解决。一些同志存在着一种心理:一切问题都在于经济增长不够,以为先要有经济增长,然后才能谈其他;经济增长后其他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就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不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时进行改革中的法制建设,加强教育,经济能否真正增长?二是在经济增长后,还能否顺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发展教育?这两个问题都值得深思。在现阶段,我国政治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大。经济决策和利益的分配实质上还是通过政治实现的,失误的决策和不公平的分配、不廉洁的政治活动都严重地损害了经济效益。1987年我国国民总收入近一万亿元人民币。但据抽样计算,决策失误损失、贪污漏税、公款吃喝、侵占公款、外汇的非生产性使用等加起来就达近一千亿元。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千多亿的损失均是由于政治行为、违法行为造成的。如果年度国民收入损失达十分之一,还怎么保证实现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益。经济增长后再进行

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无疑给发展留下障碍,经济增长也必然导致不公平分配和增大各种非劳动收入比例。如××市现在居民储蓄总额已超百亿,而这百亿财富的64%集中在4%的人手里。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在短短的几年中,这些人是怎样积聚这些财富的,这些财富积聚过程是否创造了价值,这些财富是否进行生产性投资?结论似不乐观。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把商品生产奠定在法制基础上,官商结合,官倒、大倒集中财富形成新的社会势力,将给社会带来严重压力,越来越难以解决。我们认为,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法制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新秩序、为政清廉的改革配套,是及时和必要的。所以,我们认为不要再争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谁先谁后,公平效率哪个重要。改革的全面目标和改革的现实要求现在必须实现配套改革,实现在起点、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开展竞争,不能再单思路的把经济视作唯一的目标,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唯一途径。

§5 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 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必然会触动、调整不同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利益。由于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与现代工业、商品生产的关系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意识追求不同,对改革的态度也就不同。一般说,我们社会中所有利益集团、社会阶层都是改革的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不能够不应该分析哪些阶层是改革的主导力量,哪些阶层是改革的基本力量,哪些阶层是改革中依靠的力量。社会之所以不重视知识分子,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知识分子是代表社会未来的主导力量。之所以要求全社会重视知识分子阶层,这不仅因为知识是生产力,也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追求是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的。确定了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进一步就要研究各阶层所付的代价结构,研究怎样避免获益主体与代价主体的分离。在改革中,人民群众应该准备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如果付出的代价过重,所付出的代价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补偿,而另有利益集团、社会阶层在不付代价、少付代价的情况下获得重大利益,这就是代价主体与获益主体分离,这种分离将会引起社会动荡。

§6 发展的协调 社会发展,不是自然界的演化。社会发展规律不是自然发展规律,而是主体运动规律。主体运动规律最大特点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客体必然制约性与主体选择作用的统一。哲学界近些年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面前人不是无能为力的被动主体,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主体。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他的选择作用对于社会的发展方向、发展途径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哲学界这一研究成果应该吸收到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中,应该指导与参与改革的实践。我们似应认识到:发展不是社会历史规律脱离人的作用的自然结果,主体要对发展加以协调。那种借口社会发展规律必然性,而放任发展中问题的作法,不但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且是极不负责的态度。

协调发展是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任何地区、城市、行业、企业,其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质量的发展均应追求动态的平衡,即在一定的时间内,发展中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诸方面必须处在一定比例之中。比例倾斜,即使某一指标上去了,但由于破坏了系统质也必然导致畸形发展、恶性发展。例如,一些地区、单位为了在短期内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产值,人力、资源、能源高投入、拼消耗、拼设备。结果只能是经济上去快、下来也快、没有后劲、遗患无穷。从长远看弊大于利。我国有限的资源、能源是经不起这种“只图今日乐、何管明朝忧”的疯狂投入的。近年我国水土流失、气候恶化、水质下降皆与破坏森林有关。再看能源投入,我国每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耗能居世界第一位。相当于苏联1.7倍、美国2.3倍、日本6.1倍。我国每亿美元产值的材料成本也居世界前列。高投入低产出换来的经济增长,是挖肉补疮。我们再不能片面追求产值、利润而无节制投入,无顾忌地破坏生态了。

协调发展,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对发展进行控制和调整,包括对发展目标的适当调控,对发展途径的调控,对发展力量结构的调控,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调控。调控就是处理关系,而处理关系就是避免单因素论、单打一。调控就是不满既成决定,不断实行追踪决策。

§7 发展中人的问题 鉴于我们在改革中对人的问题重视和研究不够,我们认为发展中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更大关注。发展中人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功能方面和目标方面。功能方面是指人是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发展生产,完善体制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目标方面是指社会主义改革不仅要有生产力发

展目标, 经济发展目标, 还要有人的主体目标, 即在改革实践中提高人的素质, 实现人的价值,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论从功能方面还是从主体目标方面来看, 都需要我们加强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先从改革中发挥人的功能角度看。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生产的总趋势提高, 突出了人的因素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社会化规模的扩大, 社会系统的强化, 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 这不仅要求劳动者个人有更高的劳动技能, 而且对劳动者的责任心、道德感、纪律性的要求也提高了, 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独立决策能力的要求也提高了。劳动者如果不适应上述要求, 不但不能很好地在生产劳动中发挥作用, 创造价值, 还会造成人为的事故和巨大的损失。所以, 改革中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 必须注意人的问题, 注意提高人的素质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改革中, 实现个人生产力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 也要求解决“人的问题”。在《资本论》等著作中, 马克思曾提出了“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这两个范畴。在马克思看来, 个人生产力是人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体力、智力和劳动技能的总和。个人生产力通过劳动方式、协作、分工、管理等中介形成社会生产力。“个人生产力”状况对社会生产力有重要影响。在前一阶段改革实践中, 人们比较注重劳动方式、管理方式等“硬件”方面的改革, 并试图通过这些改革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忽视了对如何充分发挥个人生产力的研究, 以致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 责任心不强, 纪律松懈, 劳动积极性不高, 竞赛流于形式, 奖金起不到鼓励生产积极性的作用, 消极情绪蔓延滋生, 甚至大量盗拿生产资料、工厂设备。领导对这些现象也视而不见, 明哲保身。这些现象说明, 只从劳动方式、管理等“个人生产力”结合为“社会生产力”的结构方式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够的, 还必须深入研究激活“个人生产力”的途径, 研究人的问题。

再从改革中主体发展目标看。我们的改革应该是一个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性, 实现人的价值的过程, 而不是为了搞改革而搞改革, 为了搞现代化而搞现代化。就其最高目的而言只能是为了提高人的主体地位, 实现人的主体价值, 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人的主体性。

在改革过程中, 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主体价值, 把经济收入、个人消费看成主体的最大价值所在, 模糊了人们对主体价值的认识, 以致许多人把改革和现代化只看成是一场经济达标事业, 把人只看成是达到经济指标的工具、手段, 而忘记了实现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的价值才是改革和现代化的主体目标。

在一定意义上说, 主体为了实现未来的目的, 必须以自身的现实异化为手段。但是, 这种异化是有限的, 是以不失去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只把人当成生产的工具和手段, 当成感性动物, 这是与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衷相悖的。这些情况出现, 暴露了我们在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目标的制定和宣传中, 对主体目标的研究、宣传重视不够。我们的改革, 也是人们学习进入现代社会, 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学校, 实现人的发展的学校。在改革与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方面全社会要以提高人的主体地位, 实现人的价值为主体目标, 另一方面人们也必须自觉地把改革、现代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校, 自觉地把自已作为对象来完善。改革的过程不仅是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而且是改革人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也不仅是物的现代化, 而且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 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的现代化过程, 是人的发展过程。在改革实践中, 人们对各种体制改革比较注重, 而对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却有所忽视, 其不良后果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了。任何人都要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自觉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否则势必落伍。

§ 8 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改革、发展作为一场社会变革, 必然引起社会的震荡、诱发一些特有的社会问题。这需要我们从事发展社会学角度, 而不是从一般社会学角度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从发展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下列社会问题亟待研究并给出科学认识。

第一, 经济活动在社会上的非经济作用。例如, 中国卷烟生产问题。我国现在是世界卷烟生产大国, 每年卷烟产值200亿元左右, 占产品利润前列。可是如此大规模生产销售卷烟, 造成的综合损害决非200亿可比。大部分火灾是因为吸烟引起; 吸烟使肺癌发病率成倍上升; 中小学生学习吸烟已很普遍; 民族体质急剧下降。外国人戏称: 中国八亿烟民, 需林则徐再发动禁烟运动。再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允许、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在促进社会生产,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在非经济方面, 其负作用却没有给以系统的评价, 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比如在购货、销售、缴税过程中存在着大量

行贿行为，违犯法律，腐化了社会空气。

第二，社会性短期行为。不仅是工矿企业存在短期行为，教育、科研、文化、卫生领域也存在短期行为。举凡涉及基础性的投资，人们能减就减。工业生产中拼设备、压缩基础性投资，农业生产中土地投入逐年减少，教育投资增长落后于行政投资，使得全社会发展缺少后劲。

第三，社会性失控。改革与发展意味着要改变旧有的秩序，必然要引起一些震荡。但社会不能失去控制，不能让社会自行震荡。现在计划失控、投资失控、消费失控、交通失控、专卖事业失控、办学失控，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失控现象。现实极需要对社会性失控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性伪劣行为。现在不仅是个别商品假冒劣质，而是形成了社会性伪劣行为。各类商品假劣不过是社会行为假劣的物化表现。吃、穿、住、行，举凡人所涉及的一切，几乎都有假冒。如不采取措施，制定对策，在社会性伪劣行为的冲击下，改革和发展也难免变质。

第五，社会性腐败现象。从广度上看，社会各阶层、各领域都存在腐败现象，决策层、领导层尤为突出。从程度上看，挥霍浪费、奢侈胡为，令人发指。腐败必然无能。如不彻底根治社会腐败行为，社会就会在腐败中崩溃。

第六，新的犯罪问题。近些年，除重大经济案件增多外，集团案件、赌博、卖淫、青少年犯罪也急剧增加，甚至黑社会现象也开始出现。法律制定要有预见性。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综合治理，使得改革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保障。

§9 当前改革的关键和困难 中国要发展，必须改革。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不能是面面俱到的纸上谈兵。而应是可进入操作的现实理论。“这里就是罗得斯，你就在这里跳舞吧！”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应对中国当前改革的关键问题和最大困难，给出自己的回答。

我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关涉到中国改革能否夭折、能否蜕变的关键问题，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最大困难。我国政治权力结构是一种纵向结构。这一结构造成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奉迎的依附性人格。加之，我们对政治缺少行之有效的人民监督、舆论监督，缺少行之有效的横向制约，这就极易使得政治权力乃至一切公共权力失去限制。同时，我国还是政治权力至上的国家。经济活动、司法活动、意识形态乃至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缺乏独立性。这又使得政治权力领导、决断一切。政治渗透力、弥散力极强。泛政治化、用政治立场做一切活动最后价值取向、善恶评断标准的土壤还很丰厚。没有得到很好制约的权力渗透到一切领域，必然在各领域诱发一系列问题。

决策问题。我国经济决策、政策实施和对经济活动效益的最终分配，实质上都是政治权力做出的。首长项目、长官拍板并不乏见。凭长官意志、个人感受决定理论是非也非仅有。而决策失误、观念荒诞造成经济损失、不白之冤却很难去找领导负责。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短期行为、宏观失控、通货膨胀、贫富分化、政府腐败、环境破坏，不能说与我们出台的决策不完善、措施不配套无关，与我们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不够无关。腐败问题。从社会学观点和苏联东欧改革的实际情况看，社会主义社会腐化指数体系，主要是由以下指数构成：腐化干部占干部总数比例，腐化干部的职位级别，腐化干部的堕落方式，腐化干部受惩及逃惩之比。据我们占有的统计数据，现在我国干部腐化指数是建国以来最高时期。有人说，干部腐化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我们认为这是倒果为因。并不是商品经济造成了无限制无制约的权力和权力的滥用，而是无限制无制约的权力渗透到商品经济领域摇身成“官批”、“官倒”。所以，人民群众才说要“解决‘官倒’必先‘倒官’”。

再看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是因为真正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弱化、分解一部分人的公共权力，把公共权力置于民主监督、人民制约之下。这对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是很痛苦的。他们是不愿意因政治体制的切实改革而削弱自己的权力的。他们或是想方设法拖延政治体制改革，或明动暗不动。改革伊始，我们砸经济上的“铁饭碗”，说砸就砸了。可砸政治上的“铁饭碗”，实在困难。

廉洁有效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是保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条件。为了改革的深入发展，现在已到了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而推进民主化进程，对公共权力实行限制和监督，又是保证政府廉洁、决策科学的前提。所以，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下转第26页)

2.基础产业落后和超负荷承载制约经济发展的现象有增无减。由于电力紧张和电价偏低,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由1953——1975年的1.875下降到1976——1980年的1.11和1981——1985年的0.59。交通运输产业的运能与需求的差距拉大,加重了运输与生产和流通的矛盾。邮电通讯产业的增长也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基础产业的短线制约,使其有互补关系的较多供给处于滞存状态,成为无效供给。

3.加工产业脱离能源、原材料产业而过快发展,使原材料产业落后于加工产业的矛盾加剧。1979——1985年,采掘工业增长27.5%,原材料工业增长67.7%,而制造工业却增长了93.6%。制造业占重工业的比重,曾由1978年的52.5%调整为1981年的44.2%,1986年又回升到52.9%。再加上转移障碍,互替资源或长线产品无法替代可替代的短缺资源或产品,就导致加工工业发展大量依赖原材料进口。钢材进口量占消费总量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17%上升到近三年的36%,纯碱由28%上升到34%,钢由15.7%上升到43%,铅由21%上升到44%,锌由5%上升到70%。而外汇短缺又难以承受这种发展趋势的需要。

结构失衡对总供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效供给不足,而滞存同时存在。结构失衡加剧了总量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通货膨胀必然是需求拉起与结构失衡(还有成本推进)交织在一起的混合型通货膨胀。

我国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是形成通货膨胀局面的主要原因。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又相互推动,一方面总量失衡是结构失衡的基础,另一方面结构失衡又加剧和巩固了总量失衡。因此,治理通货膨胀仅仅从总量入手或仅仅从结构入手都是片面的,必须从总量与结构两方面同时入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在加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同时,还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宏观管理的微观基础。一方面要加快企业改革,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要加快价格改革,完善市场体系,使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动员无效供给为有效供给

(本文作者:姚林 南开大学经济系副主任) 责任编辑:陈清华

(上接第9页)这一方向并不与整顿经济环境任务相背,也许它正是治理经济环境的根本措施。仅靠经济因素是治理不了通货膨胀,建立不起来商品经济秩序的。因为通货膨胀、商品经济秩序的破坏主要是由非经济政治腐败无能所致。

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民众素质太低,让他搞民主都不知怎么搞。这种说法绝难成立。1776年美国建国时,英属殖民之人民的素质高过我们人民吗?美国实行民主制,不也实行了吗?须知,知识阶层、人民群众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已日见高涨。通过限制、制约公共权力推进民主化进程,这不是针对着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人而言,而是根据公共权力运行规律而言。任何公共权力都自身具有三种倾向:一是具有追求扩大的倾向。这正是中国民谚所说:“骑着毛驴想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因而权力总想渗透到各个领域,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渗透。二是具有逃避制约的倾向。谁掌握权力,谁也不愿意接受限制和制约。而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三是权力具有给掌权权力的人带来各种利益的倾向。这使得掌握权力的人更易气指颐使、抱权不放。正因为权力具有这三种倾向,公共权力才越需要接受监督。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对政治权力实行监督和制约,肯定公民有赋予候选人公共权力及收回公共权力的权利,这是保障公共权力在法制范围内起作用,不异化为私权柄的根本保证。

(本文作者:高清海 吉林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孟宪忠 吉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景来